

# 职业评价的中日比较

——SSM 调查与哈尔滨市调查的比较分析

园田茂人 张汝立

**Abstract:** Many studies on occupational prestige point out that every society has same type of occupational hierarchy irrespective of her history or culture, but such assertion does not fit our daily observation.

This paper will compare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 and criteria for judgement in China and Japan to check whether they share the same structure of evaluation of occupation by the data of Harbin City survey in 1993 and Japanese SSM survey in 1995. As a result, we can find some uniqu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spite of their superficial commonality in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

## 一、问 题

“如何对职业进行评价”，其“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的有关研究成果较多，并且，从有关职业声望的研究课题看，关于如何对职业进行评价的问题，也一直是作为职业研究的中心课题而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这显然是因为职业不仅是能够测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而且通过对职业进行社会评价，还可以反映人们的等级观念。

令人惊异的是，人们发现无论是地区间比较还是历史比较，职业声望结构均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例如莱曼(Treiman)详细分析了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职业声望得分，发现虽然与白领职业相比，蓝领职业间的共同性少一些，但他认为“各个社会对职业声望的评价是非常相似的，看不到在特定的地域和文化中这种共同性的显著差异，这可以为否定是文化决定职业声望的观点提供依据”(Treiman, 1977: 102)。另外，曾对美国的资料进行过纵贯分析的霍杰等人(Hodge, Siegel, Rossi, 1996)，以及对日本和中国台湾进行过同样分析的直井优(1979)和瞿海源(1985: 121—140)，也指出未发现职业声望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特点。的确，1995年在日本所进行的SSM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sup>①</sup>中的职业声望调查结果与1975年相比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

然而，上述结论与日常的一些观察结果却略有出入。

第一，关于职业声望结构具有超越地域的相似性特征这一结论并不完全成立。

例如，日本企业一般都重视劳动技能，但是，不只是在欧美，而且建于亚洲的日本企业对当

<sup>①</sup> SSM 是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英文缩写。该调查自1955年开始，每10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其主要目的是对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及其变动进行实证研究。1995年的SSM调查是此项调查研究活动的第5次，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日本全国336个地方发放9739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571份，有效回收率67.5%。

地的大学毕业生并不重视劳动技能也表示强烈不满,<sup>①</sup> 这表明日本人和当地人对职业声望及其等级评价并不具有共同看法。

另外, 园田茂人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调查时发现, 朝鲜族的男性因忌讳从事建筑工作, 因而当地的建筑工地几乎都是招聘山东省的民工来工作,<sup>②</sup> 据说当地的习俗认为“男子汉在人间应或为官或务农, 而不屑于体力劳动”。因此, 朝鲜族无法提供迅速产业化所需要的体力劳动者, 而不得不从远方招聘劳动力。这两个事例说明职业声望结构并非不受文化的影响。

第二, 针对时间因素的变化是否对职业评价的影响会带来较大的变化的观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所依据的哈尔滨市的调查是在 1991 年和 1993 年两个时点进行的, 这期间, 即 1992 年发表了邓小平南方谈话, 调查表明虽然仅间隔 1 年时间, 但人们对外资企业工人和个体户的评价明显增高, 而对国营工人的评价则明显下降。

另外, 职业声望结构即使相同, 但其意义也会存在差异。例如 A、B、C、D 4 种职业声望在不同地区即使排列次序相同, 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排列次序, 则无法从结构本身推知。这样看来, 关于职业评价的认知要素也有必要考虑, 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和日本受“土农工商”这一传统结构影响较大的社会, 更应考虑这一点。

重要的是对不同职业的评价进行描述与分析时应把握到怎样一个程度。总的看, 或许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过于注重决定职业评价的结构, 所以, 往往只能是大致把握职业声望结构, 因而也许会得出空间上或时间上相似的结果。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将运用日本和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职业声望调查资料, 尽可能详细地探讨地区间职业评价的共同性和异质性。

## 二、调查资料的说明

### (一) 资料的特性

本文所使用的哈尔滨市调查资料是张汝立于 1993 年调查的结果。此前, 即 1991 年进行了相同的调查, 其结果已发表(张汝立, 1993), 1993 年的调查是对其进行的追踪调查。

哈尔滨市的调查问卷参考了日本 1975 年的 SSM 调查结果, 因此, 职业范畴及职业评价的标准等与 SSM 调查有部分相似之处, 这就为对中日部分职业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不过, 将哈尔滨市调查资料与 SSM 调查资料进行比较时须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哈尔滨市调查属于市一级水平, 而 SSM 调查属于国家水平; 二是这两项调查所使用的抽样方法不同。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是从 SSM 调查中抽取一部分具有与哈尔滨市相似特性的城市进行比较。哈尔滨市作为黑龙江省的省会并不是不可与东京都相比, 但是, 东京都的样本选择难度较大。而且, 就产业构成和城市基础来看, 哈尔滨市与东京都并不具有更多的相似点。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说, 本文是将哈尔滨市作为中国的城市代表来进行分析的。此前, 中外学者在北京市(Lin & Xie, 1988: 793—832)和广州市(蔡禾、赵钊卿, 1995)曾进行过职业声望调

① 在园田茂人正在进行的“亚洲日资企业中的日本员工的意识与行为”的课题中, 这种烦恼几乎普遍存在于所有的日资企业。

② 该调查是以日本山口大学佐佐木卫氏为中心, 于 1997 年的 7 月下旬到 8 月中旬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进行的。作为其成果的一部分已发表(园田茂人, 1998)。

查,从职业声望得分看,两城市并没有大的差异。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因变量不同地域的差异固然很大,但不应过分强调这一前提。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哈尔滨市的调查采用的是按职业类别的定额抽样法(1993年的调查是按11个职业类别各抽取100人作为样本的),<sup>①</sup>而这与采用按地域分层系统抽样方法抽取的SSM样本显然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因此,作为次善之策,本文选择SSM调查中与哈尔滨市调查中的相似项目进行比较。但是,如果将哈尔滨市调查的11个职业类别都与SSM调查进行比较,不只是不可能,而且也无意义,因为大学教师和高中生、大学生等在SSM调查中样本数过少。因此,本文只选取两国调查中相似的4种职业,即行政机关的官员、农民、大工厂的工人和个体户来进行比较分析,它们正好代表了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结构。

另外,上述两项调查还具有如下基本特性:

就二者比较而言,从SSM调查来看,男性年长者样本较多,与此相比,1)在哈尔滨市调查中,工人和个体户的性别差异并不像日本那样明显;2)在日本社会,农民和个体户一般均为年龄较大者从事,而在中国,由于个体户是新兴职业,所以平均年龄比较“年轻”。

从哈尔滨市调查来看,大学毕业比率达34.4%,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原因是样本中官员的大学毕业比率较高(85.0%),从中可看出中日两国的官员在社会特性上的差异(见表1),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表1 哈尔滨市与SSM调查资料的基本特性

职业	男性比率(%)		平均年龄(岁)		大学毕业比率(%)		样本数	
	哈尔滨市	SSM	哈尔滨市	SSM	哈尔滨市	SSM	哈尔滨市	SSM
官员	64.0	58.2	37.2	43.3	85.0	28.1	100	79
农民	56.0	47.2	31.5	55.0	6.6	9.4	100	53
工人	38.8	72.2	36.5	38.8	21.9	37.5	100	72
个体户	57.0	81.0	31.1	50.5	9.5	33.3	100	84
合计	54.0	66.3	34.1	46.4	34.4	28.1	400	288

## (二)分析的项目

哈尔滨市调查和SSM调查在问卷中可进行比较的共同项目,除性别、年龄和学历这几个变量外,仅有在对20种职业进行评价时所依据的7个标准的重视程度。在哈尔滨的调查问卷中,重点调查的是被调查者的父母职业和期望子女从事的职业及其理由;而在SSM调查中,调查的重点则是家庭收入和职业属性。由于侧重点不同,这些项目均无法比较。

根据以上情况,本文分析的核心是职业声望得分。在比较哈尔滨市调查和SSM调查时,有必要调整两者得分的零乱状态。一般来说,日本人在进行某种判断时往往采取中性的暧昧的态度(林知己夫,1995:184-185),而中国人则多采取明朗的态度(中根千枝,1994:97-98)。另外,在中国,也存在着对某个职业群体评价较低,而对另一个职业群体评价则较高的情况。事实上,在哈尔滨市调查中,对某种职业声望评价时回答“非常高”、“非常低”的比率较高;并

① 这11个职业阶层是:1.哈尔滨市和兴地区的个体户;2.哈尔滨市公共汽车公司的司售人员;3.哈尔滨铁路局退休工人;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5.哈尔滨星光机器厂工人;6.黑龙江省政府机关干部;7.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8.哈尔滨市动力区郊区农民;9.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和中文系的教师;10.哈尔滨秋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员;11.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和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100人),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应届毕业生(100人)。

且,无论是在哈尔滨市调查中,还是在SSM调查中,农民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得分均高于官员的评价。<sup>①</sup>

因此,对中日间或职业群体间进行比较时,并不是单纯地比较得分,而是将从个别得分中减去平均得分的数值作为比较的尺度,本文称其为“修正职业声望得分”,使之与以往的职业声望得分相区别。

以往的SSM调查均采用计算职业声望得分的方法,即将评价最高者定为100分,比较高为75分,一般为50分,比较低为25分,最低为0分。同理,将评价职业时所重视的因素分别规定为非常重视为4分,比较重视为3分,不太重视为2分,一点不重视为1分。与对职业声望得分的处理方法相同,本文将根据以上方法所得到的得分减去平均得分的数值当作评价职业时对评价标准的重视程度(以下简称为重视因素得分),并称其为“修正重视因素得分”。

本文将首先从总体上概述中日间在职业声望得分和重视因素得分的职业评价特征上的差异,然后探讨二者的关系及不同职业群体在职业声望得分或重视因素得分上的差异。

### 三、中日的职业评价:概观及特征

#### (一)职业声望的中日比较

表2显示的是中日职业声望得分状况,其中加上了台湾地区1988年的调查结果中可能进行比较的部分职业。从表中可以看出,中日职业声望得分是比较相似的,同序相关系数为0.88,显示出很强的相关性。

当然,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对不同职业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图1显示的是中日两国的修正职业声望得分,结果显示,中日间在医师、音乐家、农民这几种职业上的声望得分相差10分以上,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农民的评价过低的情况。实际上,在1975年的SSM的职业声望调查中,农民是分为自耕农和佃农来进行调查的,其职业声望得分分别为45.0和28.1。这种差异也反映在台湾地区调查的结果中(见表2)。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于农业政策不将农民划分为自耕农和佃农,而是在农民这一范畴下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因此难以想象近似日本的自耕农和佃农的职业形态是什么样子。在目前的日本社会中,农民几乎都是自耕农,如果上述结果近似日本的佃农的话,从数值上看中日间或许没有大的差异。

下面,为了理解职业声望在结构上的特征,我们对20种职业声望得分进行了因子分析,看一看能抽取哪些因子,并且,将解释力超过10%的2个因子分别计算了因子负荷量(见表3)。

令人感兴趣的是,中日双方都抽取了“职业无贵贱”因子,这一因子在日本为第二因子,在中国则为第一因子,其顺序逆转。当然,无法判断这一因子是否真实,但考虑到中国长时期所进行的“职业无贵贱”的教育效果,这一差异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其贡献率是第二因子的2倍多,以此与日本相比,可以说是被相对强化的因素。另外,由日本的第一因子和中国的第二因子正负方向几乎一致这一情况,可判定它们对不同社会间的职业意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关于它们分别表示什么意义,须进一步探讨评价的标准问题。

<sup>①</sup>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对同一地点的纵贯分析。据马尔修(Marsh)关于台北的职业声望调查来看,在1963年到1991年的28年里,职业声望得分的平均值下降8分(Marsh, 1996: 49)。

表 2

职业声望得分的中日比较

	日 本		中 国		台湾地区	
	得 分	标准差	得 分	标准差	得 分	标准差
医 师	89.3	15.4	71.3	18.2	74.6	18.0
法 官	86.0	17.5	84.0	18.9	79.0	22.1
大学教授	83.5	16.7	75.0	19.8	87.7	15.4
飞 行 员	81.3	18.5	71.6	20.7	74.6	17.2
运 动 员	69.1	20.7	67.3	20.3	—	—
音 乐 家	67.3	16.0	79.1	19.4	76.7	16.9
护 士	59.7	16.5	50.6	17.1	0.5	17.5
市政府科长	57.4	12.9	59.3	21.8	—	—
警 察	56.3	15.3	58.0	24.7	65.7	21.4
银行职员	56.1	12.5	60.4	18.1	—	—
保 姆	52.6	12.5	56.2	20.9	73.6	18.6
木 工	52.7	14.7	39.0	21.7	—	—
理 发 师	51.1	10.9	44.1	22.2	—	—
电 工	50.5	11.3	47.7	19.1	—	—
厨 师	50.4	12.5	52.8	21.7	63.6	18.8
个 体 户	50.3	10.0	40.5	25.5	59.3	15.3
公共汽车司机	49.1	10.7	46.7	18.1	56.0	18.7
农 民	44.8	16.3	28.0	29.7	69.5	23.3
商店营业员	43.6	13.0	42.5	16.9	54.9	17.9
矿 工	37.9	18.7	29.9	24.2	58.1	25.1

注:台湾资料来自于 Tsai 和 Chiu(1991: 247—249)的研究。该资料在将评价尺度分为 5 个等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因为将“一般”赋予 60 分,所以数值显得高一些;另外,样本构成也存在差异,所以并不一定能进行正确比较。

表 3

职业评价的结构特征:因子分析的中日比较

	日 本		中 国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医 师	.707	.217	.407	.472
法 官	.689	.255	.202	.465
大学教授	.731	.091	.371	.382
飞 行 员	.650	.304	.463	.430
运 动 员	.386	.323	.502	.225
音 乐 家	.505	.323	.325	.430
护 士	-.070	.686	.506	.149
市政府科长	.455	.261	.498	-.045
警 察	.205	.450	.470	.219
银行职员	.457	.111	.433	.202
保 姆	-.138	.454	.480	.200
木 工	-.285	.565	.444	-.448
理 发 师	-.237	.554	.510	-.378
电 工	-.187	.549	.640	-.119
厨 师	-.146	.454	.487	-.121
个 体 户	.107	.247	.390	-.314
公共汽车司机	-.136	.589	.612	-.279
农 民	-.493	.424	.366	-.393
商店营业员	-.349	.243	.422	-.116
矿 工	-.473	.436	.528	-.389
贡 献 率	18.2%	17.3%	21.4%	10.1%

注:数值为因子负荷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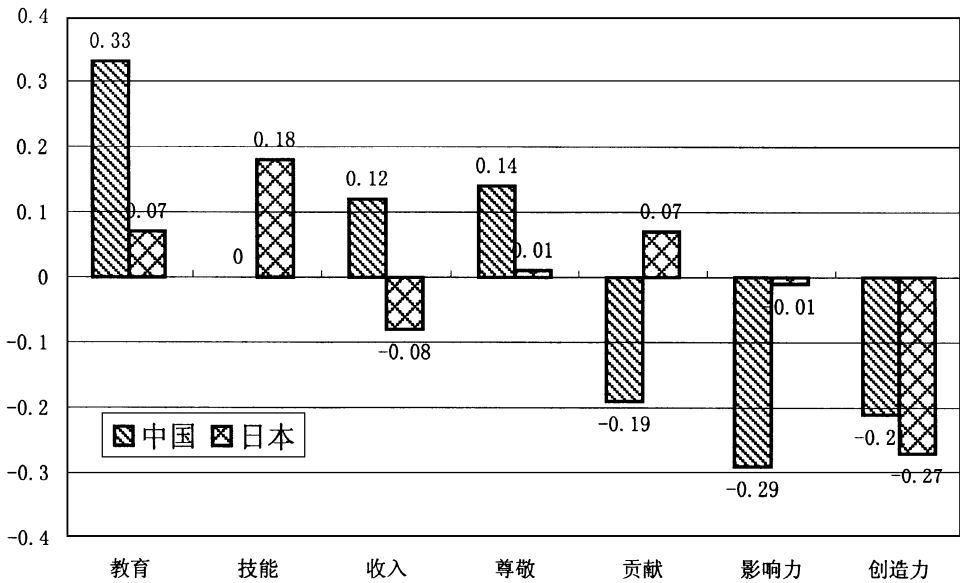


图 1 修正重视因素得分(中日比较)

## (二)评价标准的中日比较

以下我们将看一看修正重视因素得分的中日比较结果。

从图 1 可知,与职业声望得分具有极强的相似特征不同的是,中日间在职业评价标准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即日本重视的是技能和对社会的贡献,而中国重视的则是教育和尊敬的程度,尤其是围绕着收入这一标准,中日间的差异更加显著;而且,中国比起日本来,对各标准的评价得分显得零散一些,评价重点很不集中。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评价职业时的重视因素进行了因子分析,中国和日本分别得出了不同因子。在日本解释力最大的第一因子是“都重视”因子,它与职业声望得分的第二因子相对应,贡献率达 41.7%。另外,根据教育和收入为正,贡献、影响力、创造力为负的因子负荷量这一结果,可推测出第二因子是与职业声望得分的第一因子相对应的显示实质评价标准的因子(见表 4)。

表 4 评价标准的结构特征:因子分析的中日比较

	日 本		中 国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教 育	.575	.536	.358	-.470
技 能	.556	.070	.670	.167
收 入	.468	.682	-.060	.884
尊 敬	.773	.139	.492	.218
贡 献	.758	-.350	.725	-.039
影响力	.752	-.334	.687	-.029
创造力	.570	-.450	.692	.218
贡献率	41.7%	17.3%	32.8%	15.5%

在中国,第一因子是“非金钱评价”因子,或“为人民服务”因子,第二因子是“金钱评价”因

子,完全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因子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中国,这个第一因子对应于职业声望得分的第一因子,第二因子对应于相同的第二因子。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围绕着职业评价以收入为轴心形成二个因子,可以说这种情况说明了在否定金钱这一物质刺激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改革开放后引入物质刺激的中国现实状况。

此外,以日本和中国的第二因子来看,显示出中日两国在以下两个特征上的差异:1)收入与学历的关连性;2)收入和创造力的关连性均逆转。

关于1),笔者认为,它表明在日本的特征是高学历高收入,而在中国则是高学历低收入。这是因为,在日本为了获得高收入须有相应的学历资格;而在中国,拥有高学历未必获得高收入,并且还可能出现“脑体倒挂”现象。

关于2),它表明在日本,一种职业能否获得高收入,并不在于它发挥创造性的程度,而在中国则是能发挥创造性的职业获得高收入。与1)的解释相同,在日本要获得高收入须通过专业资格考试,而在中国则存在着体制外高收入的途径。实际上,与很难出现新型企业的日本不同,中国不断地产生新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其从业人员的学历与收入的关系存在着相悖的可能性。总的说来,这一事实表明中日间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存在着差异。

另外,为了加深理解,笔者计算出了中日双方评价职业时的重视因素得分的相关矩阵(见表5),从中可进一步检验上述分析的可行性。

表5 重视因素得分的相关矩阵:中日比较

	教育	技能	收入	尊敬	贡献	影响	创造力
教育	1.0000	.3377	.3964	.4064	.2167	.2614	.1222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43
技能	.3377	1.0000	.2180	.2716	.2804	.2386	.3348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收入	.3964	.2180	1.0000	.4081	.1427	.1492	.0622
	p=.000	p=.000	p=.000	p=.000	p=.017	p=.012	p=.304
尊敬	.4064	.2716	.4081	1.0000	.5031	.4796	.2625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p=.000
贡献	.2167	.2804	.1427	.5031	1.0000	.6283	.3910
	p=.000	p=.000	p=.017	p=.000	p=.000	p=.000	p=.000
影响力	.2614	.2386	.1494	.4796	.6283	1.0000	.3970
	p=.000	p=.000	p=.012	p=.000	p=.000	p=.000	p=.000
创造力	.1222	.3348	.0622	.2625	.3910	.3970	1.0000
	p=.043	p=.000	p=.304	p=.000	p=.000	p=.000	p=.000
	.0942	.3615	-.0289	.1858	.3523	.3993	1.0000
	p=.061	p=.000	p=.566	p=.000	p=.000	p=.000	p=.000

注:上部分数值表示日本的相关系数,下部分表示中国的相关系数。

### (三)重视因素得分能否决定职业声望得分?

以上我们比较了中日间在职业评价及其评价标准方面的差异。下面我们试图将职业声望得分作为因变量,将重视因素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把握影响个别职业的评价标准,据此可进一步看出中日间在职业评价上的差异。

表6和表7分别为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从中很容易看出,在对7个重视因素得分所做的多元回归分析中,相对来说,日本的结合较密切,而中国的结合不理想。而且,在中国未发现不同职业的要素和不同职业的特性以及与表3中的第二因子相关连的评价标准。即影响个别职业的评价标准即使存在,也不是在系统地发挥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后文将详细分析。

表6 职业声望得分的决定因素:重视因素得分的多元回归分析(日本)

	教育	技能	收入	尊敬	贡献	影响力	创造力	显著性水平
大学教授	++		++					**
公共汽车司机								
法官	++							**
理发师				-			++	**
飞行员	+	++	+					**
保姆								*
厨师								
警察								
运动员			++		-			**
银行职员			++					**
农民	--		--				++	**
医师	++							**
商店营业员								**
护士								*
个体户					++			**
音乐家								**
市政府科长								
木工			--				++	**
矿工								**
电工								**

注:++表示 $\beta$ 系数为正,显著性水平0.01,+表示显著性水平0.05;--表示 $\beta$ 系数为负,显著性水平0.01,-表示显著性水平0.05;\*表示多元回归方程式的显著性水平为0.0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5。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结合较好,并且可明确指出与表3第一因子中显示出较高绝对值的医师和法官、飞行员、音乐家(以上为正)、农民(以上为负)结合紧密的变量是学历和收入。以修正重视因素得分来看,根据上述分析也可以理解日本的收入和学历虽然不像中国那样显示高分值,但在评价个别职业时却能成为重要的依据这一情况。反过来说,在中国评价职业时,虽然说重视学历的高低和受社会尊敬的程度,但在对个别职业的评价得分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职业声望得分和重视因素得分的结合不好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考察两国间不同职业群体对职业评价的差异。



表 7

职业声望得分的决定因素: 重视因素得分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国)

	教育	技能	收入	尊敬	贡献	影响力	创造力	显著性水平
大学教授								
公共汽车司机							—	
法官								
理发师								
飞行员								
保姆				+				*
厨师						+		
警察			++					**
运动员								
银行职员		+						
农民				++				*
医师						+		
商店营业员		++						
护士	++		++					**
个体户				+				**
音乐家			++					*
市政府科长								
木工								
矿工						++		**
电工		++						

注: ++表示 $\beta$ 系数为正, 显著性水平 0.01, +表示显著性水平 0.05; --表示 $\beta$ 系数为负, 显著性水平 0.01, -表示显著性水平 0.05; \*\*表示多元回归方程式的显著性水平为 0.01,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5。

#### 四、不同职业群体对职业的评价

##### (一) 不同职业群体对职业声望评价的中日比较

如前文所述, 在两国样本中, 我们选取了官员、农民、工人、个体户这 4 种职业群体, 他们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得分见表 8。

如表 8 所示, 尽管两国对职业评价很难取得一致, 但中日两国农民对各职业评价得分均较高这一点则是共同的。另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官员对各职业的评价得分较低, 即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 中国的官员具有对职业评价苛刻的倾向, 这或许是因为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个阶层的大学毕业比率偏高所导致的。这个结果是否准确当然难以断言, 但在中国由于大学毕业比率尚不足 10%, 因此, 与日本的官员相比显得更加突出。这种精英意识在大学教授和法官、飞行员、医师这几种职业以外则相对较弱。

以各职业群体对自身及其它职业的评价来看, 上述差异显得更加突出。为简便起见, 我们选择与各职业群体相近似的市政府科长(官员)、农民、电工(工人)、个体户(商人)这 4 种职业比较一下他们对自身及其它职业的评价差异, 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官员对其它职业的评价相当苛刻。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农民, 他们对市政府科长的评价得分高于农民自身职业 33 分, 对电工的评价也高于农民自身职业近 18 分, 可以说农民对自身职业声望的评价极低。不过, 农民与个体户的评价得分差异不大, 由此可知, 农民虽然敬重“士”和“工”, 但对“商”却不那么看重。

表 8

不同职业群体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得分: 中日比较

	日 本					中 国				
	官员	农民	工人	个体户	显著性水平	官员	农民	工人	个体户	显著性水平
大学教授	78.3	88.7	87.1	81.9	**	71.8	79.0	73.2	76.0	*
公共汽车司机	49.0	52.9	46.2	49.4	**	39.3	55.0	47.7	45.0	**
法官	83.6	90.7	89.2	82.5	*	84.0	86.5	81.6	84.0	
理发师	52.0	50.0	51.4	50.6		37.3	50.3	48.7	40.3	*
飞行员	76.3	83.8	86.1	80.1	*	71.8	75.0	67.6	72.0	
保姆	52.3	53.9	51.7	52.7		53.0	59.8	54.1	57.8	
厨师	51.3	51.0	48.1	50.6		48.3	57.8	58.2	47.3	**
警察	47.3	60.7	58.7	55.4	*	47.5	65.5	57.9	61.3	**
运动员	65.5	71.6	76.7	63.9	**	63.3	69.5	63.8	72.5	**
银行职员	52.3	59.6	57.3	56.3	**	62.0	60.5	59.4	59.5	
农民	46.4	43.1	45.1	44.1		23.3	39.0	26.3	23.3	**
医师	86.8	93.3	93.0	85.8	**	71.5	72.0	68.9	73.0	
商店营业员	44.4	47.1	40.1	43.7	*	38.8	47.3	43.1	41.0	**
护士	59.9	61.1	60.4	58.1		47.3	54.5	48.7	51.8	*
个体户	52.6	46.6	51.4	49.7	**	34.3	44.5	42.9	40.5	*
音乐家	69.1	65.7	71.2	63.3	*	78.5	80.0	78.3	79.8	
市政府科长	55.6	59.6	58.7	56.6		52.3	72.0	53.6	59.3	**
木工	53.0	55.3	53.8	50.0		36.5	47.8	40.3	31.5	**
矿工	39.3	36.5	34.5	40.2		27.5	40.0	27.0	25.0	*
电工	51.3	52.4	48.6	50.3		46.0	56.8	44.9	43.3	**
平均得分	58.5	60.7	60.5	58.2		51.8	60.6	54.3	54.2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 0.01, \*表示显著性水平 0.05。

## (二)不同职业群体的评价标准的中日比较

上述职业群体间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在对职业评价标准的重视方面显得更大一些。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第一,日本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而中国则比较显著,尤其是在对收入的评价上官员和其它职业间的差异更大一些,即中国的官员在对收入的评价得分上是负值,而其他职业为正值,并且是仅次于教育的高分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官员已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内化的结果,或体制外灰色收入的可能性高于其它阶层的缘故。

第二,就相同的职业范畴来看,日本的官员比较重视技能和贡献,而中国的官员比较重视教育和尊敬,其得分有明显的差异。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中日两国的工人和个体户对收入和技能的评价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日本工人比起收入来更重视技能,后者比前者高 15 分,而中国的工人则相反,收入得分比技能多 40 分。据我们观察,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工人为了能在一个企业长期工作而重视技能,而中国工人则是如果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甚至不惜辞去现有的工作。

最后,我们以不同职业群体对 7 种重视因素的评价得分为对象进行了主因素分析,其结果见表 9。从中很容易看出,在日本,无论是哪个职业群体,“都重视”因子都是作为主成分被析

出,而在中国,仅有农民近似于日本的“都重视”因子,除此之外其余均具有“为人民服务”因子的特征,并且在官员中其特征更突出。

表 9 不同职业群体的评价标准的结构特征:主成分分析的中日比较

	日 本				中 国			
	官员	农民	工人	个体户	官员	农民	工人	个体户
教 育	.563	.418	.548	.640	.320	.183	.531	.400
技 能	.718	.331	.502	.560	.660	.633	.588	.680
收 入	.568	.165	.453	.506	-.303	.255	-.089	-.078
尊 敬	.762	.678	.786	.806	.301	.656	.479	.501
贡 献	.721	.862	.780	.791	.711	.700	.707	.691
影响力	.679	.815	.677	.827	.678	.652	.780	.663
创造力	.634	.589	.332	.598	.741	.712	.560	.651
贡献率(%)	44.6	36.1	36.0	47.1	32.0	34.2	32.7	31.7

注:数值为因子负荷量。

如上所述,在日本不同职业群体的重视因素得分及其因子结构未见大的差异,而在中国各职业群体间的差异则相当大。当然,无论是中日哪一方,就不同职业群体来说,即使将职业声望得分作为因变量,将重视因素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也会因为样本数少,缺乏解释力而无法进行。

##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职业声望得分,发现对若干职业的评价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两国的等级结构都是相似的。

第二,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中日双方在职业声望得分上的共同因子是“职业无贵贱”因子,它在日本为第二因子,在中国为第一因子。

第三,以评价职业的标准来看,中日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日本重视的是技能和贡献,而中国重视的是教育和收入。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日本突出的是“都重视”因子,而中国最具解释力的因子是“为人民服务”因子,它与作为第二因子的“金钱评价”因子正相反。

第四,以职业评价的标准来解释职业声望得分的力度,在日本比较强,与中国相比,评价相对较低的标准,实际上对职业声望得分的影响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第五,就不同职业群体对职业评价的得分来看,中国的官员得分较低,与农民的评价反差较大。

第六,以职业评价的标准来看,中国的职业群体间的差异比日本大。

如本文开篇所述,以往的职业声望研究多强调存在等级结构,本文也不否认这一倾向。但是,就中日两国来看,其具体意义和评价上的差异却是很显著的。例如,在中国,人们在评价职业时重视教育和尊敬、官员对农民和商人评价较低、农民对自己的评价较低,这仿佛再现了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此外,根据在评价职业的标准上“为人民服务”因子与“金钱评

价”因子的拮抗,以及通过“金钱评价”因子所看到的教育与收入呈负相关等情况,可揭示出在中国存在着现行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一事实。

另外,在日本尽管收入和学历的重视因素得分并不高,但影响职业声望得分的实际力度却很大,未发现影响形成职业声望得分的第一因子这一真实现象与原则的背离,以及各职业群体在评价标准上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日本比中国的社会身份的平均化倾向更强一些。

当然,由于样本的关系,以上结论能否适用于中国整体则无法定论,尚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调查研究的发展主要受制于调查的进展,所以,以往的职业声望研究仅能强调其等级结构的状况,而对表面上拥有相似文化的东亚间的比较研究则比较缺乏,我们一方面将继续将其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同时也期待出现更有见地的实证研究。

#### 参考文献:

蔡禾、赵钊卿, 1995《社会分层研究:职业声望评价与职业价值》,《管理世界》第4期。

瞿海源, 1985,《台湾地区职业地位主观测量之研究》,《第四次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林知己夫, 1995,《从数字中来看的日本人》,德间书店。

园田茂人, 1997,《中国职业声望的结构与变迁:哈尔滨市的调查结果》,载日本国文部省重点领域研究:现代中国的结构变迁研讨会论文。

——, 1998,《延边的朝鲜族:龙井市太阳镇100户的调查结果》,《亚洲时报》1月号,34—59号。

中根干枝, 1994,《多民族社会的中国:同质社会的日本》,载中村治编《日本和中国:这里之不同》,德间书店。

直井优, 1979,《职业地位的尺度构成》,载富永健一编《日本的阶层结构》,东京大学出版社。

张汝立著, 1993,《中国地方城市的职业声望:哈尔滨市的调查结果》,园田茂人译,《中国研究月报》第10期。

Hodge R. W., Siegel P. M., Rossi, P. H., 1996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Bendix, R. Lipset, S. M.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ee Press.

Lin, N., W. Xie, 1988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3.

Marsh, R. M., 1996,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Social Change in Taipei: Taiwan Since the 1960s*, M. E. Sharpe.

Sonoda, S., 1997, “The Taiwanization of China?: The Rise of Joint Ventures and Its Impact on ‘State Capac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Sociology*, Faculty of Literature, Chuo University, vol. 169.

Treiman, 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ademia Press.

Tsai, S. L., H. Y. Chiu, 1991, “Constructing Occupational Scales for Taiwa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10.

作者园田茂人系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博士

张汝立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宛丽